

论《马氏文通》的写作是马建忠洋务救国行动的继续

○ 王 庆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 马建忠被语言学界称为语法学家, 然而其生平志愿却并不仅在语法, 他更看重自己的事功。他一生都在办理洋务, 主张富民强国, 可是, 马建忠并没有得到时人的太多理解, 在近代史上他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他是在兴办洋务受挫, 遭到李鸿章的排斥之后, 才退居家中从事《马氏文通》的写作。他认为富民强国必须熟悉洋务, 而熟悉洋务必须从学习西洋语言开始, 学习语言又必须以语法为基础。这就促成了《马氏文通》的诞生。《马氏文通》的写作是马建忠办理洋务、富民强国行动的继续。

[关键词] 马建忠; 《马氏文通》; 富民强国

马建忠, 中国近代第一部汉语语法著作《马氏文通》的作者, 他是一位出色的语法学家, 中国之有现代意义上的语法学, 以《马氏文通》为始。可是, 马建忠又不仅仅是一位“语法学家”, 他撰著《马氏文通》的背后有更宏大的抱负和更深远的意义。

马建忠是在办理洋务受挫之后才退居上海寓所正式撰写《马氏文通》; 而且, 除了《马氏文通》之外, 他还在 1879 年编译了《法国海军职要》, 1896 年刊行《适可斋纪言纪行》, 生前还编纂了一部 95 卷的巨著《艺学统纂》, 介绍有关西方“算、绘、矿、医、声、光、化、电”^[1]等自然科学理论方面的知识。可见, 《马氏文通》只是马建忠众多著作中的一种。要全面了解马建忠, 必须深入研读马建忠的其他方面的著作, 尤其是《适可斋纪言纪行》。

作者简介: 王庆,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普通语言学、语言文化。

马建忠青年时代就受到了西学的初步训练,之后又游学欧洲,取得了巴黎政治学院的五个学业官凭,他熟悉外交和洋务,认同西方先进文化,终生都在思考如何“访求西法,师其所长”^[2],以求富民强国之道;马建忠又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浸染,主张经国济世,实业救国,他更看重自己的事功,将其文集命名为《适可斋纪言纪行》,足见他深受“立德、立功、立言”^[3]这一儒家信念的影响。马建忠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经国济世的思想指导下,积极帮助李鸿章办理洋务,提出了一系列富民强国的思想,薛玉琴称他为“启蒙思想家和洋务活动家”^[4],许国璋也曾大力挖掘《马氏文通》中的语言哲学思想,称马建忠为“教育家而兼语法家”^[5],所以,仅仅从语法学方面来认识马建忠是极不完整的。本文将马建忠放在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下考察,认为《马氏文通》的撰著是马建忠洋务强国思想行动的继续。

一、马建忠的简单生平

1. 家世

马建忠(1845-1900),字眉叔,江苏丹徒(今镇江市)人。马家是天主教世家,据马建忠的哥哥马相伯说:“我们家庭奉天主教由来很久,大约在利玛窦到中国来以后,我们的祖先便成为教徒。我的外公外婆也是奉天主教的。”^[6]马建忠出生后不久,就经过了洗礼,取教名为“玛弟”。^[7]由于从小就生活在天主教的环境中,马建忠很少有中国传统的封建迷信观念。马家也有着深厚的儒家渊源。马建忠的二十一世祖为南宋末年宰相马廷鸾,二十世祖马端临著《文献通考》。马建忠受到了浓厚的儒家文化的熏染,“一生以经世报国为己任,虽历经坎坷而矢志不渝,就充分体现了儒家文化倡导的积极入世的精神。”^[8]

2. 徐汇公学时期

1853年,因清军与太平军在镇江交战,马家辗转迁沪,年仅八岁的马建忠进入徐汇公学,同此前就在徐汇公学学习的哥哥马相伯一起读书。徐汇公学是法国耶稣会在上海新创设的一所教会学校,马建忠兄弟就成为了中国近代内地最早一批接受西学的知识分子。马相伯和马建忠兄弟二人在学校表现出色,《马相伯先生年谱》载:“先生(马相伯)与眉叔(马建忠)学习于上海徐汇公学,昆季齐名,慧声日起。”^[9]

马建忠在徐汇公学受到了比较扎实的中国文史方面的训练,本来是要参加科举考试的,这也是教会所提倡的,可是因为战乱,未能克行。“徐汇公学与当时的官学及科举制度保持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入官学,中科举,不但受教会的责难,相反,还将受到公学师生的鼓励。”^[10]

除了中文方面的扎实训练之外,马建忠还打下了坚实的外语基础。他有超常的语言天赋,不仅学习法语、英语等现代语言,还学习了拉丁文。徐汇公学创办于1850年,学校教育的绝大部分时间主要是学习中文,只有那些学有余力,出类拔萃的青年才俊才能较早地进入学习拉丁文的行列。马建忠在1894年所写

的《拟设翻译书院议》中自述说：“余生也晚，外患方兴，内讧洊至，东南沦陷，考试无由，于汉文之外，乃肆意于辣丁文字，上及希腊并英、法语言。盖辣丁乃欧洲语言文字之祖，不知辣丁文字，犹汉文之昧于小学而字义未能尽通，故英、法通儒日课辣丁古文词，转译为本国之文者，此也。”^[11]

3. 从李鸿章幕府到法国留学

1870年，因不满教会对待中外修士不平等、不公正的行为，马建忠愤然离开了教会，通过家庭和社会关系进入李鸿章幕府，襄办洋务。在有关马嘉理案的中英烟台谈判中，马建忠表现出色，刘体智《异辞录》称“丹徒马眉叔，通达中外情势，颇有翊赞之功云”^[12]，故深得李鸿章的赏识。1877年，李鸿章保举马建忠以郎中衔作为随员，随福州船政学堂学生前往法国留学。到法国后，马建忠进入巴黎政治学院专习公法，最终顺利取得文字（文学）、格致（理学）、律师（法学）、政治、出使（外交）等学科的单科文凭（似非毕业证书）。^[13]

4. 办理外交和洋务

1880年4月，马建忠从法国学成归国，到天津谒见李鸿章，把在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先后获得的五个文凭上呈李鸿章。李鸿章早就称誉马建忠是洋务大人才，至此遂重用。^[14]7月9日李鸿章向清廷保荐马建忠，在奏折中称：“因该员于三月间回津谒晤，将在洋先后应考所得五次官凭呈验。臣逐加考询，华学既有根底，西学又有心得，又历试以事，均能折衷剖析，不激不随。凡过津各国公使、领事，无不同声引重，实堪胜专对之选。”^[15]11月，李鸿章让马建忠主持天津水师营务处的日常工作，办理海军事务。

1881年3月，马建忠为海军船坞选址到旅顺勘察地形，并去矿区考察，撰成《勘旅顺记》；6月又奉李鸿章之命，为了杜绝鸦片走私，将鸦片贸易总归一处代理进口，增加清政府税收，到越南、新加坡、印度等南洋各地调查鸦片输入情况，就鸦片问题同英印总督交涉，撰《南行记》。马建忠下南洋时，途经新加坡，当时辜鸿铭正奉派在新加坡海峡殖民地政府服务。“听说马建忠到此，辜鸿铭即前往拜访。两人一见如故，三日倾谈，马建忠竟使自称为‘假洋人’的辜鸿铭人生观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变，这或许是两位沐欧风浴美雨、接受过近代科学启蒙的有为青年在国家、民族危亡之秋所达成的共识吧。辜鸿铭回家后，作彻夜思考，第二天即到殖民地政府辞职，决定返回祖国，为国效力。”^[16]

1882年，马建忠三次出使朝鲜，先是协助朝鲜与美、英、德三国签订通商条约，并为之草拟条约草稿，6月又会同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赴朝鲜平定壬午兵变，将朝鲜高宗生父大院君李昱应擒拿至天津。

1884年，马建忠为上海轮船招商局会办，在上海刺探法军情报，协助议约。6月，由于中法战事紧张，为了防止法国劫夺招商局的船只，马建忠建议将招商局的局产暂且售于美国旗昌洋行，由其代为经营。为此，马建忠被人弹劾，被指为汉奸，几至菜市口斩首。光绪十年八月初八日马建忠致盛宣怀函称：“弟自六月初十日后心力焦碎，担负有千钧之重，谤积丘山，他日事定收回，可以释然。从此

辞差告退,不复问人间事矣。”^[17]

1885年,马建忠从美国旗昌洋行收回招商局;1887年,建议李鸿章借款开办合资银行,不久与美商代表会谈,拟定《华美银行简明章程》;1890年,任上海织布局总办,整顿上海织布局。1891年旗昌洋行倒闭,李鸿章责令马建忠追偿旗昌欠款。1892年,马建忠遭李鸿章摈斥,家居上海昌寿里,得以有时间从事撰著。1893年上海织布局被焚,损失惨重,马建忠与徐沛之在上海设立信昌丝厂。

5. 逐渐退身洋务,以撰述为职志

1894年,马建忠家居上海,以著译为业。甲午海战失败后,撰《拟设翻译书院议》;1895年,以参赞道员身份随李鸿章到日本马关商订合约,又以道台之衔去台湾办理交接。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办《时务报》,从马建忠学习拉丁文。梁启超与马建忠校定《时务学堂章程》。1898年,《马氏文通》前六卷出版。1900年9月1日,李鸿章主持庚子和议,途经上海,急招马建忠,要求他担任外交助理,并令马建忠赶译一份俄国专电。马建忠连夜赶译完这份俄文专电,竟于9月3日与世长辞,死在为李鸿章翻译俄文公文上。^[18]

二、马建忠的最根本思想:办理洋务,富民强国

从以上马建忠的简单生平可以看出,马氏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洋务,其最根本的思想是:办理洋务,富民强国。这也是当时比较先进的中国人的共同思想。马建忠是如何有此认识的呢?

1896年,马建忠在其《适可斋纪言纪行》的“自记”中申说了“其所以考究洋务之缘起”,他说:

“余乃深惟发逆蔓延半天下,而其残忍嗜杀,势同流寇,仅足为目前患;独洋人以师舟于数万里外载一旅之师北上,款成,全师屯上海,民与安焉,若罔知有变故也者。而我朝士夫被此莫大之耻,专务掩匿覆盖,以绝口不谈海外事为高,直无有深求其得失之故以冀得一当者。然则他日彼族为祸之烈,不察可知矣。于是决然舍其所学,而学所谓洋务者。始求上海所译书观之,未足餍意,遂乃学其今文字与其古文词,以进求其格物致知之功,与所以驯至于致治之要,穷原竟委,恍然有得于心。窃尝欲上下中外之古今,贯穿驰骋,究其兴衰之所以,成一家之言,举以问世,顾有志未逮。”^[19]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马建忠见识卓绝,他一眼就看到清末的危机主要不在太平天国而在西洋列强。因此,他“决然舍其所学”(当是科举应试之文——王庆注),发奋学习西方,从事洋务,尝欲一究西方列强的“兴衰之所以”,成一家之言;前期可能由于他忙于实业,无暇停下来从事撰述。从他自身的经历和观察来看,他认为学习西方,必须要懂西方,要懂西方,仅看译述不行,即“未足餍意”,这才发奋学习西方的古今语言文字,进而求其格物致知之功与社会所以兴盛的原因。这是当时有识之士的必然选择。观之当今,情形依旧。要想学习西方,必须首先学习西方的语言,进而学习其现代科技,再探索其政治、体制的优

势。近现代以来,中国也正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1878年夏,马建忠在法国给李鸿章的信中写道:

“窃念忠此次来欧一载有余,初到之时,以为欧洲各国富强,专在制造之精,兵纪之严;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讲富者以护商会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护商会而赋税可加,则盖藏自足;得民心则忠爱倍切,而敌忾可期。他如学校建而智士日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其制造、军旅、水师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20]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到,到法国才一年有余的马建忠已经认识到,办洋务不能只注重制造和军工,而应该发展工商业,达到富民强国的目的,正如他在1890年所著《富民说》中所言“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1897年,在给汪康年的信中,马建忠还抱怨说到清廷的当轴者“将一切富强之策,不暇思索,一句抹倒”^[21]。可以说,马建忠一生都在寻求富民强国的道路。

三、马建忠在办理洋务中的深切体会:必须兴办教育,改变观念

马建忠在办洋务的过程中深切体会到,要想富民强国,必须兴办教育,改变观念,以期“转移风会”^[22]。最初他忙于洋务和实业,没有时间去考虑兴办教育的事,况且当时人们的正统观念是科举,连马建忠也不例外。办理洋务之后,他逐渐看到科举制度下出来的人才多是不识时务的庸才,这时才认识到教育的重要。

自从清政府派出驻英、法两国公使后,遣使出洋成为一种惯常行为。马建忠曾指出,清廷遣使出洋是向西方学习的一个好机会,使臣在驻在国可以实地观察与感受。他在1878年的《玛赛复友人书》中说:“中华士大夫之深究其理而幡然改图,固莫若令我使臣庄岳其间,朝夕观摩,以为他日返国之师资,而不失邻善之望也。”^[23]可是,这些公使的随从人员却多由公使本人随意拣选其幕僚,马建忠对这类幕僚的素质非常不满意。他说:“参赞、随员等名目,不过为调剂私交之具,而非为襄理公事之材。其得之者,亦自知侥幸而来,不过计数年积居薪水之资,为异日俯仰饔飧之计。如必考求实学,则当读其方言。舌音初调,而瓜期已届,倥偬返旆,依然吴下阿蒙。问所为洋务者,不过记一中西之水程,与夫妇女之袒臂露胸,种种不雅观之事。即稍知大体者,亦不过曰,西洋政治大都重利以尚信。究其所以重利尚信之故,亦但拉杂琐事以为证,而于其本源之地,茫乎未有闻也。”^[24]这时,马建忠就提出“拟于上海设一学院”培育翻译人才,并规划好了具体的课程内容,认为“不出十年,风气开,而士习变,不但使署无才难之叹;且先以正业群经加之,时习孔教根本,体力用行,日后或可内调以赞国政,未必出乎此。”他还说:“吾华人从古不与外人相闻问,未读其史,未习其语,一旦远涉数万里而谓于其政教风俗之本末可以习知,譬犹使学语乳孩啾呀而中乐节,未髡赤子扶服而嫫礼容,虽有枣梨之诱,夏楚之威,终两穷而无所施矣。”^[25]

在1881年《上李伯相覆议何学士如璋奏设水师书》中,马建忠建议设立海

军学堂。他说：“欧美水师之分强弱，不在船而在兵。”“练将之法自学院始，练兵之法，自练船始。”提出在“广州、福州、上海、天津等处设立水师小学”，意在“分设小学，以广收罗”。小学优秀者，送入水师大学院，“大学院以专造就水师所需人才”，“初入学院之幼童，约派教习六人以教之，学院必课英文者，欲其异日通晓外洋专门书籍，不至故步自封也。”^[26]

中日甲午海战失败之后，马建忠痛感培养人才的急迫，立即提出设立翻译书院的奏议，即《拟设翻译书院议》，希望通过培训译才和译书的方式实现办洋务强国的梦想。《拟设翻译书院议》第一句话就是“窃谓今日之中国，其见欺于外人也，甚矣。”他看到中国受列强欺负之甚，而外国列强“敢于为此者，欺我不知其情伪不知其虚实也。”要不被西洋列强所欺，必须深入了解各国列强的虚实，就必须培养新型人才。他说，“今也倭氛不靖，而外御无策，盖无人不追悔于海禁初开之后，士大夫中能有一二人深知外洋之情实而早为之变计者，当不至有今日也。”^[27]

退身商海后，马建忠与维新派人士多有往还。曾义务教授梁启超、麦孟华、徐勤、汪康年等人拉丁文。在1896年，马建忠协助梁启超议定《时务学堂章程》。在给汪康年的信中，马建忠“感慨‘当轴昏昏犹若’，‘遇有倡言新法者，不曰中外之情不同，则曰必有流弊，将一切富强之策，不暇思索，一句抹倒’。所以，他认为，当今时务并非是急于变法，不如先做好教育、宣传等基础工作，而要做好教育工作，必需大量引进西学，以资参考。‘弟以为当今挽回风气，最要之法，莫如翻译。’”^[28]可见，这时的马建忠已经深刻认识到，仅仅是办理洋务还不足以富民强国，还需要创办教育，更新观念。

四、撰写《马氏文通》是马建忠洋务强国行动的继续

马建忠在《马氏文通》的序中说：“爰积十余年之勤求探讨以成此编。盖将探夫自有文字以来至今未宣之秘奥，启其絃滕，道后人以先路。……则愚十余年力索之功庶不泯也已。”^[29]马建忠两次说到《马氏文通》一书是他积十余年求索之功的成果，可见，早在他办理洋务的时候就已经在考虑撰写《马氏文通》了，可能这时仅仅搜集资料而已，或许是同别人（有人说与其兄马相伯）探讨，或者竟已开始断续写作了。后来，因为在官场和商场上受到排挤和构陷，最终受到李鸿章的槟斥，家居上海，这才有充足的时间从事著述。

在1878年的《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中，马建忠曾说：“忠自维于各国政事，虽未能窥其底蕴，而已得其梗概，思汇为一编，名曰‘闻政’。”^[30]可是马建忠构想的《闻政》最终没有结果。郭嵩焘的日记中对此也有记载：“其欲以所见闻汇为一篇，名曰《闻政》，分列八门，一曰开财源，二曰厚民生，三曰裕国用，四曰端吏治，五曰广言路，六曰严考试，七曰讲军政，八曰联邦交，似欲假西法以附于中土语经济之学；其名近似，而于西洋立国之本，固亦未有当也。”^[31]1894年，马建忠在《拟设翻译书院议》中说：“曾拟将诸国政教之源流，律例之同异，以及教

养之道,制用之经,古今沿革之凡,货财敛散之故,译为一书,而为事拘牵,志未得遂。近复为世所诟忌,摈斥家居,幸有暇日,得以重理旧业。”^[32]在《适可斋纪言纪行》的自记中,马建忠也说:“窃尝欲上下中外之古今,贯穿驰骋,究其兴衰之所以,成一家之言,举以问世,顾有志未逮。”^[33]可以看出,马建忠早就有志著述,成一家之言,可是为事拘牵,这些事应该就是洋务中的外交和实业。

1895年2月,马建忠以参赞道员的身份随李鸿章赴日本马关商订合约,5月马建忠又随同李经方,仍以道台之衔去台湾办理交接。此时在国内,李鸿章被骂为大汉奸,马建忠被骂为小汉奸,可能正是在这种心境下,马建忠已经绝意官场和商海,这才有闲暇在上海寓所闭门著述,开始撰写《马氏文通》,悉心研究中国文法,得以继续其洋务强国的梦想,这虽然没有办理洋务那样直接,可是仍是长线的洋务强国行动。这一点,或许并非为大多数人所认识,故详论如下:

1. 《马氏文通》的撰写是其发愤追求自强的表现

马建忠非常自强,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青年时期他愤然离开教会,就是一种自尊自强的表现,这与教会的歧视有关。1870年,马相伯、马建忠兄弟住在徐汇公学一座朝南的房间,他们已经在此居住几年了。这一年,从巴黎来了一位法籍修士,修院的塔扬神父让马相伯兄弟立即让出这个房间给法国的修士,而搬到朝北的房间去。在塔扬神父看来,中外修士是有高低之分的。血气方刚的马建忠,受不了这种屈辱,愤然离开教会。^[34]

在法国留学期间,马建忠也表现出非常强烈的自强和自尊。郭嵩焘的《伦敦与巴黎日记》说:“眉叔天分高出一切,于西法初涉其流,便怀易视之心,殆犹中土虚骄之气然也。”^[35]可以看出,马建忠对西洋并不是盲目崇拜,反而是常怀“易视”之心。郭嵩焘任大清国驻英法公使任满后回国,接替者为曾纪泽,郭嘱马建忠为曾纪泽在巴黎租赁房屋。租的是利格夫人的房子,在房租问题上,马建忠与房东产生了争执。最后,马建忠不屈不挠,极力杀价,房子租了下来,却弄得房东利格夫人十分头疼。曾纪泽到法国后,利格夫人曾怒气冲冲地向曾纪泽告了马建忠一状,声称此人太刁顽。1879年10月12日,曾纪泽日记中记载:“眉叔狂傲,待西人不以礼,人多衔之。利格夫人谈及马建忠,则轩眉切齿,怒不可解。巴黎士绅,下至娼优、妓女,亦有得恨之者。”^[36]当李鸿章得知这种情况时,不但不批评马建忠,而是为马建忠叫好。

马建忠对由不平等条约而导致的畸形的中国关税制度十分不满,总想利用一切机会改变这种受气的状况。1879年5月,英国公使威妥玛为中外交涉仪式和洋货免厘问题,向清廷总理衙门提出修约要求。马建忠根据自己所学习的公法,认为可以“兹乘其有修约之意,不妨因计就计,就西国所论税则之理而更定中国增税之章,以与厘金相抵。”“仿照各国通商章程,择其可加者加之,以与厘金相抵,然后将厘卡尽行裁撤,省国家之经费,裕我库储,使商贾之往来,苏其隐困。……今宜振刷精神,力图补救,将从前税则痛加改定。”提出“中国据理以争,何畏不情之请。”^[37]

马建忠的自尊自强还表现在他主张“收回利权”。王尔敏曾说道：“‘收回权利’，提倡之人是马建忠，为时在光绪十六年(1890)。”^[38]1890年8月11日盛宣怀致马建忠函中说：“似此收回权利要政，筹三十万款，何难之有？”^[39]则马建忠致盛宣怀函中必有“收回权利”之语。1879年，马建忠《上覆李伯相札议中外官交涉仪式洋货入内地免厘禀》中说：“而中国渐悉外洋情势，且又设立招商局以分其利，由此推广，而机器织布开煤炼铁，渐可收回利权，以为富强张本。”^[40]1890年在《富民说》中说：“务使每年所织之布足敌进口十分之一，方足为收回利权之善策。”^[41]马建忠时刻不忘捍卫国家的权利，在《巴黎复友人书》中说：“庶几遇大事有知变应变之才，足以折服众人之意气，捍卫吾国之利权矣。”^[42]

马建忠之所以主张设立翻译书院，学习外语，培养外交人才，也是为了自强，不被列强所欺。他在《拟设翻译书院议》中说：“外洋各国……率皆以本国语言文字不惮繁琐而笔之于书，彼国人人得而知之，并无一毫隐匿于其间；中国士大夫其泥古守旧者无论已，而一二在位有志之士又苦于语言不达文字不通，不能遍览其书，遂不能遍知其风尚，欲其不受欺也，得乎？”^[43]

《清史稿》在谈到马建忠的时候说，“愤外患日深，乃专究西学……发愤创为《文通》一书”，^[44]其使用“发愤”一词是极有见地的。在《马氏文通》的后序中，马建忠也预言，读了《马氏文通》，“而后童蒙入塾能循是而学文焉，其成就之速必无逊于西人。”^[45]从这些话语，我们确能深刻感受到马建忠的发愤、自强精神。

2. 《马氏文通》的撰写是其教育理念中的一步

清末以来，许多睁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如“郭嵩焘、薛福成、马建忠、黎庶昌等人，目睹西方列强的强盛，深感中国要想迎头赶上去，就必须走改革的道路。”^[46]而改革从什么入手呢？对马建忠来说，其原来所办洋务，有一大部分在甲午海战中灰飞烟灭。这时，他深刻认识到，要图强除了办理洋务之外，还需通过教育造就人才，“教育救国”曾成为一时的口号，而教育中重要的一步就是学习语言，既包括外语也包括我们的母语。

其实，当时很多人早就认识到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的重要，而学习语言文字，语法又是最重要者。例如，曾纪泽早就认识到语法的重要，在给《文法举隅》所写的序中说：“国家怀柔所暨，琛赆所通，殊方异俗，至于十余万里。于是讲求经济之学者，以通知各国语言文字为当务之急。数十年来，中外多闻强识之士，为合璧字典数十百种。或以点画多少为经，或以音韵为目，或以西洋字母为序，亦既详且博矣。然而说字义者大多，谈文法者少，则譬诸鞴鞞胥具，轮辕不缺，而无寸牵以制辐，盖终不可行焉。余尝欲取英国文法译以华言，纷纭鲜暇，因循遂已。汪君芝房所学邃于余，纵谈既洽，因以属之，阅月而成册，虽翮缕证据未逮原书，然名目纲领大致已备，亦急就之奇觚，启蒙之要帙也。”^[47]

马建忠兄弟对于语言的作用体会很深，他们深知不懂西方语言，要想透彻了解西方是不可能的。马建忠在计划培育外交人才的建议中就首先提到外语的学习。马建忠在《马氏文通》的序中说：“爰积十余年之勤求探讨以成此编。盖将

探夫自有文字以来至今未宣之秘奥,启其絨滕,道后人以先路。”^[48]因此,我们可以说,《马氏文通》就是要从语言学习上给人“导夫先路”。

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担任《时务报》主笔,跟马氏兄弟交往密切,成为忘年交,马相伯对梁启超的才华特别欣赏,对他在学业没有成熟之前过早地卷入政治也表现出十分的惋惜。“马相伯希望他趁早学一门西方的语言文字,以原汁原味地了解西方政治学说、文化科学知识。与此同时,马相伯甚至埋怨极力扶植梁启超的黄遵宪为‘贼夫人之子’。”^[49]后来,“马建忠决定义务地承担起梁启超的拉丁文教职。梁启超自然喜出望外。与梁启超一道来学习拉丁文的,还有康有为的弟子麦孟华等人。梁启超在致友人的信中说:马建忠‘每日教授他两课时,并说定一年即可读各书,可无窒碍云。’他甚至欣喜地告知友人:‘俟来岁相见时,君听我演说希腊七贤之宏旨也。’梁启超好像已经看到一门新的语言为他所开启的一片崭新世界。”^[50]梁启超说:“西人于识字以后,即有文法专书,若何联数字而成句,若何缀数句而成笔,深浅先后,条理秩然。余所见者,马眉叔近著中国文法书未成也。若俟马氏书成,可得而论次焉。”^[51]从梁启超的话语中,可以深切感到他对于汉语语法书的热望,也可以看到他对《马氏文通》的期盼之情。

3. 马建忠的写作思想与切音运动的宗旨一致

马建忠写作《马氏文通》的目的跟清末切音运动的宗旨是一致的,那就是有助于中国人士能尽快地学会语言,提高效率,能在学习语言上节省时间,从而能有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实用的学科。

《马氏文通》的“例言”中说:“各国皆有本国之葛郎玛,大旨相似,所异者音韵与字形耳。童蒙入塾,先学切音而后授以葛郎玛,凡字之分类与所以配用成句之式具在。明于此,无不文从字顺,而后进学格致数度,旁及舆图史乘,绰有余力,未及弱冠,已斐然有成矣。……如能自始至终,循序渐进,将逐条详加体味,不惟执笔学中国古文词即有左宜右有之妙,其于学泰西古今之一切文字,以视自来学西文者,盖事半功倍矣。”^[52]

1892年,卢懋章出版了《一目了然初阶》一书,他在书的原序中说:“中国字或者是当今普天之下之字之至难者。”^[53]他看到当时中国人学习汉字需要花费十多年的光阴,而“欧美文明之国,虽穷乡僻壤之男女,十岁以上,无不读书。……何为其然也?以其切音为字,字话一律,字画简易故也。”^[54]卢懋章认为,在欧美各文明之国,虽然是在穷乡僻壤,无论男女,十岁以上都能读书识字,其关键在于他们的文字是拼音文字,口语和书面语一致,文字简单的缘故。因此,为了国家的富强,他决定创制拼音文字,“窃谓国之富强,基于格致;格致之兴,基于男妇老幼皆好学识理;其所以能好学识理者,基于切音为字……省费十余载之光阴,将此光阴专攻于算学、格致、化学、以及种种之实学,何患国不富强也哉。”^[55]

从以上这两段话我们可以看出,一百多年以前,以卢懋章为代表的一些有识之士把创制拼音文字、改革语文教学同富民强国联系在一起。马建忠写作《马氏文通》跟清末切音运动的主旨是相同的,都是在富民强国。但富民强国须从

教育始,教育则自识字、文法始。

4. 为什么是汉语语法而不是英语语法

有人会说,既然当时的有识之士都能认识到学习西洋语言的重要,马建忠为什么写的语法不是英语或法语语法,而是汉语语法呢?这与马建忠的认识有关。虽然马建忠的法语水平很高,在法国巴黎政治学院考试文词科,曾获得高度称赞,巴黎报纸“传扬殆遍”,谓东土之人有文词秀才,自马建忠始。马建忠也说自己“于彼国一切书籍,庶几贯穿融洽,怡然理顺,涣然冰释,遂与汉文无异。”^[56]可是,马建忠一直认为,要想学习好外语,首先必须把汉文掌握好。在论翻译的时候,他尤其强调汉文的重要,认为汉文是基础,学好汉文可以事半功倍:“盖先通汉文,后读洋文,事半功倍,其为文理,无间中外,所异者,事物之称名耳。”^[57]从中也可以看出,马建忠具有普遍语法思想(“其为文理,无间中外”),认为学好汉语语法,再学西洋语法或可事半功倍。

孙中山先生曾谈到《马氏文通》的弊端之一:“马氏自称积十余年勤求探讨之功,而后成此书。然审其为用,不过证明中国古人之文章,无不暗合于文法,而文法之学,为中国学者求速成图进步不可少者而已;虽足为通文者之参考印证,而不能为初学者之津梁也。继马氏之后所出之文法书,虽为初学而作,惜作者于此多犹未窥三昧,讹误不免,且全引古人文章为证,而不及今时通用语言,仍非通晓作者不能领略也。”^[58]也就是说,《马氏文通》只是对古文进行分析,对当今的通用语言没有指导作用。这不能全怪马建忠,因为当时通行的书面语言是文言,读书人所学的语言也是文言,公文所用也是文言,故马建忠写的才是文言语法,他的目的是给人指示津梁,这就如同马建忠为培养专业外交人才的设计方案中,前三年专以法文、拉丁文的文词训练为主,因为在欧洲直到十八世纪拉丁文一直是欧洲的外交通用语言,不仅外交文书、外交对话用拉丁文,条约起草亦无一例外地用拉丁文。十八世纪后,法语才逐步替代拉丁文成为通用外交语言。可以看出,马建忠是出于实用角度而著《马氏文通》。

《清史稿》对《马氏文通》有很高的评价,从中可以看到当时的人对《马氏文通》的评价,“以泰西各国皆有学文程式之书,中文经籍虽皆有规矩隐寓其中,特无有为之比拟而揭示之,遂使学者论文困于句解,知其然而不能知其所以然。乃发愤创为《文通》一书,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证繁引,以确知中文义例之所在,务令学者明所区别,而后施之于文,各得其当,不唯执笔学为古文词有左宜右有之妙,即学泰西古今一切文学,亦不难精求而会通焉。”^[59]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认为《马氏文通》是实用的,我们不能站在现在的角度,去苛求马建忠撰写现代汉语的语法。

5. 《马氏文通》的最终目的不在语法,而在求道明理,以至富民强国

《马氏文通》的后序中说:“斯书也,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证繁引以确知华文义例之所在,而后童蒙入塾能循是而学文焉,其成就之速必无逊于西人。然后及其年力富强之时,以学道而明理焉,微特中国之

书籍其道理可知,将由是而求西文所载之道,所明之理,亦不难精求而会通焉。则是书也,不特可群吾古今同文之心思,将举夫宇下之凡以口舌点画以达其心中之意者,将大群焉。夫如是,胥吾京陔亿兆之人民而群其材力,群其心思,以求夫实用,而后能自群,不为他群所群。则为此书者,正可谓识当时之务。”^[60]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马建忠创作《马氏文通》的目的是,通过学习《文通》,确知华文的义例所在,进而学文,进而求道明理,最后达到群我中华之材力,“能自群,不为他群所群”的目的。最后一句话中“为此书者”,并非指撰著者马建忠,而应该指“读此书者”;如果读此书者能由此求道明理,最终达到富民强国,这就是“识当时之务”了。

马建忠可能也料到,有人会说,在当时中国面临瓜分豆剖的极其严峻的形势下,为什么精通洋务的他要写一部语法书,而不去继续办理洋务呢?在《马氏文通》的后序中,马建忠作了自问自答。他说:“而或曰:‘吾子之于西学,其形而上者性命之精微,天人之际,与夫天律人律之淑身淑世,以及古今治教之因革,下至富国富民之体用,纵横捭阖之权策,而度、数、重、化、水、热、光、电制器尚象之形而下者,浩浩乎,渊渊乎,深者测黄泉,高者出苍天,大者含元气,细者入无间,既无不目寓而心识之,间尝征其用于理财使事,恢恢乎其有余矣。今下关之抚初成,上下交困,而环而伺者与国六七,岌岌乎,识时务者方将孔孟西学,刍狗文字也。今吾子不出所学以乘时焉,何劳精敝神于人所唾弃者为?是时不冯唐而子自冯唐也,何居?’曰:‘天下无一非道,而文以载之,人心莫不有理,而文以明之。然文以载道而非道,文以明理而非理。文者,所以循是而至于所止,而非所止也,故君子学以致其道。’”“西文本难也而易学如彼,华文本易也而难学如此者,则以西文有一定之规矩,学者可循序渐进而知所止境,华文经籍虽亦有规矩隐寓其中,特无有为之比擬而揭示之。遂使结绳而后,积四千余载之智慧材力,无不一一消磨于所以载道所以明理之文,而道无由载,理不暇明,以与夫达道明理之西人相角逐焉,其贤愚优劣有不待言矣。”^[61]在《马氏文通》的前序中马建忠也提到,人们虽然学习汉语文,可是当问及“字与字相配成句之义”及所以然之理,塾师固昧然也。即使是攻乎古文词的经师,也都以为“未可以言传也”,“此岂非循其当然而不求其所以然之蔽也哉!后生学者,将何考艺而问道焉?”可以看出,马建忠最终的目的是在明理和求道。通过语法,尽快地掌握好文,再通过学文而致其道。

许国璋先生认为:“《马氏文通》两篇序和一篇例言,阐发了关于人类各族言语不达而极九译而辞意相通的见解,关于文以载道而非道,文以明理而非理的道理,关于‘因西文已有之规矩……曲证繁引以确知华文义例之所在,而后童蒙入塾能循是而学文焉’的设想;这样的气度与抱负,决不是只通一两门外国语言所能做到的。马氏的抱负是一种哲学的抱负,虽然我们还得从他的政论或函札中取得更全面的认识。”^[62]我们完全认同许国璋先生的观察,马建忠的抱负是一种哲学的抱负,这个抱负不在语法,也不仅仅在作文(章),而最终在求道和明理。

马建忠很看不起那些钻研“故纸”的人。在《上李伯相言工课书》中说：“忠逐一详对，俱得学师优奖，刊之新报，谓能洞隐烛微，提纲挈领，非徒钻故纸者可比。”^[63]在《奏设水师书》中他又一次提到“故纸”：“而今际此生民未有之创局，徒为一二钻研故纸浮议所阻……”^[64]可以看出，马建忠是鄙薄那些只知钻研故纸的人，说他们“不齐其本，徒循其末，不求其治，徒忧其弊”。^[65]在《马氏文通》的例言中，马建忠还说：“至以虚实字措诸句读间，凡操笔为文者，皆知其当然，而其当然之所以然，虽经师通儒亦有所不知。……曾以叩攻小学者，则皆知其如是而不知其所以如是。是书为之曲证分解，辨析毫厘，务令学者知所区别，而后施之于文各得其当。”^[66]从此可以看出，马建忠很看不上那些素称的“小学家”，他的著作《马氏文通》是要知其所以然，然后施之于文，进而明理达道。“由字以通词，由词以通其道”，“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67]这是戴震的观点，可是戴震之后的一些人，气象是太小了些，简直是自郅以下了。

五、结语：仅仅将《马氏文通》看作一部语法书是不够的

薛玉琴认为：“《马氏文通》、《艺学统纂》的编撰，既是马建忠政治失意之后的发愤之作，更是他在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的强烈刺激之下，对其维新思想进行反思、深化的结果。《马氏文通》、《艺学统纂》编撰时，正是维新运动在全国趋向高涨时期。在遭受人生挫折之际，马建忠仍然没有放弃其维新救国的思想抱负，只不过，他没有像梁启超、汪康年等人那样活跃在维新运动舞台的中心。在政治之外，马建忠寻求另外一条变革道路，即通过编撰文化、科学著作，从思想文化深层启迪民智，实现救国思想。正因为如此，维新运动期间，他始终以学者身份在幕后积极地支持维新人士的活动。”^[68]我们觉得，这段话对马建忠和《马氏文通》的评论是中肯的、符合实际的。马建忠有宏大的理想和抱负，其志趣绝不仅仅是满足于开创汉语语法研究（这或许竟未想过）。在鸦片战争以后，许多人深受西洋功利派思想的感染，时时处处以“务实”为主张，他们一般重事功而轻学问。^[69]马建忠在教会学校学习，更容易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这是他日后从事洋务和实业而无暇从事于著述的主要原因。不过，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清代以来，有识之士也深知：大学应自小学始，语言文字是学问的基础；马建忠从自身的语言学习经验和洋务实践中也深刻体会到语言文字的重要。基于这些认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之作《马氏文通》诞生了。

《马氏文通》初版于1898年冬，1900年9月3日马建忠去世。或许可以说，《马氏文通》的写作是马建忠洋务强国行动的最后一个重要行为。

注释：

[1][4][7][8][9][10][17][34][39][68] 薛玉琴：《近代思想先驱者的悲剧角色：马建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79、1、17、18、19、20、63、28、229、80页。

[2] 马建忠：《适可斋纪言纪行·富民说》，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六辑，台北文海出

版社,1968年,第15-16页。

[3]《左传》襄公二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5][14][62]许国璋:《论语言与语言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31、218、230页。

[6]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135页。

[11][27][32][43][56][57]马建忠:《适可斋纪言纪行·拟设翻译书院议》,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六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第216、211、212、217、217、212、216、218页。

[12]刘体智:《异辞录》,刘笃龄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第71页。

[13]马建忠:《适可斋纪言纪行·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拟设翻译书院议》,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六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73、216-217页。

[15][16][49][50][51]薛玉琴、刘正伟:《百年家族:马相伯、马建忠、马五章》,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73、104-105、179、179-180、181页。

[18]“马建忠的简单生平”部分多取材于薛玉琴(2006)及薛玉琴、刘正伟(2003)二书。

[19][33]马建忠:《适可斋纪言纪行·自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六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第5、6页。

[20][30][63]马建忠:《适可斋纪言纪行·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六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第79-80、81、75页。

[21][28]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574-1575页。

[22][26][64][65]马建忠:《适可斋纪言纪行·上李伯相覆议何学士如璋奏设水师书》,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六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第137、121-125、171、171页。

[23][24][25]马建忠:《适可斋纪言纪行·玛赛复友人书》,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六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第109、111-112、113-116页。

[29][48]马建忠:《马氏文通序》,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1页。

[31][35]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第1011页。

[36]曾纪泽:《曾纪泽集》,喻岳衡点校,岳麓书社,2005年,第362页。

[37][40]马建忠:《适可斋纪言纪行·上复李伯相札议中外官交涉仪式洋货入内地免厘票》,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六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第180、184页。

[38]王尔敏:《今典释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45页。

[41]马建忠:《适可斋纪言纪行·富民说》,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六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第20页。

[42]马建忠:《适可斋纪言纪行·巴黎复友人书》,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六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第107页。

[44][59]赵尔巽等:《清史稿》(卷446),中华书局,1976年,第12482页。

[45][60][61]马建忠:《马氏文通后序》,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3、13-14、13页。

[46]吴廷嘉:《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4页。

[47]曾纪泽:《曾纪泽集》(卷二),岳麓书社,2005年,第128页。

[52][66]马建忠:《马氏文通例言》,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5、16页。

[53][54][55]周有光:《周有光语文论集》(第四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83页。

[58]孙中山:《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42页。

[67]郭在贻:《训诂学》,中华书局,2005年,第4页。

[69]梁漱溟:《忆往谈旧录》,金城出版社,2007年,第7-8页。

[责任编辑:嘉 耀]